

From Jiawu to Wuxu: Yan Xiu and Economic Imperial Examination

Xiuyong O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Email: 2252445767@qq.com

Received: Jul. 27th, 2020; accepted: Aug. 10th, 2020; published: Aug. 17th, 2020

Abstrac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Yan Xiu served as the governor of Guizhou. During his three years of supervision in Guizhou, he advocated the practice of the world, established an official bookstore, and transformed the Ancient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to a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y”, an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utgoing requested to open special economic Branch. Liang Qichao called the Economic Special Branch the “initi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Yan Xiu became famous for this. Although the economic imperial examination ceased quickly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1898 coup”, its proposal came to an end,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rapid changes in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atmospheres, but also it deeply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modern education reform.

Keywords

Yan Xiu, Economic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mperial Examination Reform

从甲午到戊戌：严修与经济特科

欧修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Email: 2252445767@qq.com

收稿日期：2020年7月27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20年8月17日

摘要

甲午战后严修出任贵州学政，督学贵州三年期间，提倡经世致用，开办官书局，改造学古书院为具有“中

西学堂”性质的书院，并在离任之际，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此次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的“最初之起点”，严修也因此暴得大名。尽管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经济特科很快停罢，但它的提出到终结，反映了晚清科举制度变革的趋向，不仅促进了政治风气、教育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迅速转变，还深切影响了近代教育变革的走向。

关键词

严修，经济特科，戊戌变法，科举变革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严修是士大夫中较早钻研西学者，其治学以实用为主，他督学贵州时，劝诫学子的三十二箴言：“义理之学，孔孟程朱。词章之学，班马韩苏。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 [1]。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此时严修认为：“中国之学，万劫而不可磨灭者，唯义理乎。洋货虽极流通，布帛菽粟之利，不能废也。西学虽极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义理之学愈深，西学之用愈实。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见其可行于此” [2]。所以甲午战后，他在贵州学政期间做出的努力，也是基于他对中西学关系的思考，“以老树嫁接新枝” [3]，希望将西学纳入考试之中，重新激发旧制度的活力和生机。

2. 督学黔中与奏请经济特科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时任翰林编修的严修，提督贵州学政。时甲午战争爆发，严修在上折接印中曾表示：“严去取以覆真才，慎关防以祛诸弊，揆圣贤立教立意，有行重于有文；体朝廷眷士之心，所习必课诸所用” [4]。这段话成为严修督学黔中变革士风的要旨，表明了他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教育黔中学子。

严修一到贵州就发出《观风告示》，其言：“查历任下车伊始，首举观风，最为良法美意。无如相沿日久，名存实亡，教官既视为具文，士夫更嫌其赘设。往往迟至按临，敷衍数卷。揆之初意，当其不然”。其策论共四题：一、辨志；二、明师；三、平文；四、匡时，他要求学子“勿空言、勿耳食物”，各举所知“军国富强之策，民物利病之源”，以相讨论。他告诫诸生“读书将以致用也，方今时事，急须才矣” [5]，强调诸生要通晓经世致用之学，不可以不通今世之务。继《观风告示》之后，严修又发出劝学文告，略谓：“五千里外，奉使而来”目的是“窃欲得朴雅之才，不愿浮华之士”，并且指出：“方今之士习之弊，大要有二：朝而习文，夕而试律，迂道德而不谈，束经史不观，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其弊一也；口则诗书，心则货利，身则痒序，行则穿窬。言不能顾行，行不能顾言，其弊二也”。所以严修认为必须要“讲求为学之本原，推究读书之实用”，这样才能“敦品励学，以副余望” [6]。在严修的倡导下，黔中“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士林知敦实践而风气又为一变” [7]，学风逐渐得到转变。

严修到任后一直想在贵州开办具有新式教育内容的书院。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提到“书院、书局事宜，以纸记出，待绍光面议”。同年他又提到：“所论中华人士，困于帖括，自蔽见闻，及困坐不揣

其本等语，尤为切中时弊。能本其意培养人材，不特裨益地方，实可挽回此运”[8]。希望能培养出通时务的人才，以应对时局，于是严修聘西南巨儒雷廷珍为山长，改革学古书院，在学古书院开办“准齐课额，经算兼课”中西学堂式的专修班。

严修亲自授算学课，其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记写到“月课算学，是为第一次。生、监、文童共三十人。辰至午、未至酉，俱在堂上监视之”。《誓学碑》中记载“(严修)又以士生今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经，西学之本在算。特每月朔，创设算课，捐廉重奖，以开风气，黔士通代数微积者，至今遂彬彬焉。丙申秋，复建议变通书院，捐廉购置中西学书八十余种，创立科条，学兼中西，调四十人肄其中，无闻风雨寒暑，日亲督课，十越月如一日焉。黔士于中学西学，遂有日进之机”[9]。概括说出严修改造学古书院，兼课算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另有黄炎培的评价更为准确：“贵州学政严修将南书院改办经世学堂于贵阳，聘贵阳名儒雷廷珍为堂长，调各县优秀生员四十人肄业，讲授以经史算学为主，还教授时务，政要，首开贵州新风气”[10]。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在离任之际，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向朝廷提出仿照康熙、乾隆年间两次举鸿词、一次举经学的特科先例，“请破常格迅设专科”，对那些“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堪游历之选”、“工测绘之长”及“统立之专名”的人才，予以量材取用[11]。一时掀起惊天涛澜，梁启超认为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是戊戌新政的最初起点，他说：“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12]。严修的门人王文光后来也称其“丁酉清设经济特科，胪列陈述，本育才兴学之意，为穷变通久之谋。而先生规划，从西南以及全国”[13]。

3. 奏开经济特科前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

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引起了朝野震荡，遭守旧大臣阻挠，迁延观望，就连其座师徐桐也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14]。其自订年谱中也说到“因经济特科奏，见绝于徐荫轩师”[15]。而他翰林院职务，也因此悉被免去，空留一编修。此时严修虽然认识到了科法之弊端，但科举既不能骤变，所以严修也只是希望将西学纳入科举考试之中，在体制内变革科举。而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朝野早已有之。

在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就曾提出改革武举的建议：“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船、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16]。时任两广总督祁贡也曾提出类似建议，请在文试第三场中调取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学子，分别酌用[17]。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逐渐兴起，改革科举的呼声渐长。薛福成在同治三年(1864)著《选举论》一文中始倡开特科例，“然则今之取士宜如何？曰：常科之外，宜开特科，常科以待天下怙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问之古事，以觐其学；问之今事，以觐其识”。并且提出特科举无定岁，取无定数。略谓：“其举之也，或一二十年，或五六年，凡俟有大政事则举之，大谋议则举之，大恩则举之，灾异则举之。举无定岁，取无定数”[18]。

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材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9]明确提出在科举中另开洋务一科，引起激烈的讨论。光绪元年(1875)《万国公报》称李鸿章奏请别开一科，以试天文、算数、格致、翻译之学，与正科并重，“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而怀抱利器者处囊脱颖之会也”。时任道政使的于凌辰大骂李鸿章“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认为“开洋务进取一格”实际是“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并且认为“今日乏才，岂不学洋学之过哉？”[20]时任大理寺少卿的王家璧也激烈反对李鸿章开洋务一格，他认为“洋人在中国者，尚请中国文士教习经史，是能用夏变

夷。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乎？”[21]这场争论直到光绪元年奕訢上《择要条议海防诸议折》才熄止，奕訢认为“李鸿章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如王家璧等所称以洋学变科目”。但又提出“尚非仓猝所能举行”，所以这增设洋学的建议，实际仍未得以实施。能否开设专科的讨论由此开始，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琬莹上了著名的《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算学[22]才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他认为“(算学)不必特设专科”，但是建议“将明习算学之人归入正途考试，令由科甲出身之处”[23]。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后，也认为“欲尽取西学之所长，殆必以算学为先导”，但认为科举取士，“未容轻易变更”，但是“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进而提出办法，各省在岁科时，生监中有报考算学者，在其考试经古场时另出算题学题目试之。

在严修奏请开设经济特科之前，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西潮冲击，朝野面对科举改革的讨论也愈加深入，并且逐渐从改革科举内容到向废除科举制度转变。如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布《救亡决论》，认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法从何处开始？他说“莫亟于废八股”，他认为八股害在使天下无人才[24]。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撰文《科举》，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25]。

4. 诏开经济特科及其停罢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痛定思痛。“信哉言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26]。梁启超的话发人深省，科举改革在朝野上下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此时变法与兴学成了相连的关系。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请破常格迅设专科”，他认为“前岁军事甫定，皇上尝诏中外举人才矣”，但两年来“风气仍多未开也，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所以建议朝廷破常格以搜才。为此他提出六条建议：“一是新科宜设专名也”，“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由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与各省学臣，各举所知，无限人数，请旨定期考试；凡录用由于此科，皆比于正途出身[11]。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复经济特科，认为请设特科，“窃恐难行”。给出的理由是“既曰特科，事固不能岁举，而岁举之事，行之科目，亦断不能概加超擢，与以破格之迁除，朝廷立贤无方，议法必通而后久，非特科无以动一时之耳目，非岁科举无以供历久之取求，二者兼资，可分办而不可合办”。所以总理衙门主张分为特科、岁举两途，先特科而后岁举。特科仍由“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无限疆域，无论人数，咨送总理衙门，定期考试。此为特科”。特科不设定举行期限，“或十年而一举，或二十年一举”，不为常例。岁举则是“每届乡试年，分由各省学臣调取各书院各学堂高等生监，乡会试皆以策问试之”，中试者另为一榜，名曰经济正科，此为常科，三岁一举[27]。

当日光绪帝就颁布圣谕特科与岁举并行：“该衙门所议特科岁举两途，洵足以开风气而广登进，著照所议准行，其详细章程，仍著该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28]。经济特科诏下，很快在朝野之中引起共鸣，康有为代宋伯鲁拟上《请催经济特科片》，认为经济特科之设，实为因时审变在得通才。《申报》发文称：“自特科之设，文武兼资，网罗海内人材，国家自强之本其立于此乎”[29]《湘报》也发文建议：“专以经济为科举，不必再事时文，庶几心无泛骛，学有根抵，数年而后，人才得以崛起也”[30]。

举行经济特科，遭到守旧大臣的阻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载：“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乃下诏数月，而大臣迁延观望，不肯荐人，盖意欲阻挠也”[12]。如严修座师徐桐，呵斥其子副都御史徐承煜：“汝若举人，可勿见我”[31]！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帝再次下旨敦促，相关行动才陆续展开，保举四起，据统计经济特科保荐“凡二百三十五人，重荐者十二人”[32]。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湘报》称经济特科将在本年秋天举行[33]。然而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等来的却是慈禧一道谕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经济特科尚未举行即着停罢。

5. 余论

晚清以来关于变革科举的讨论并不少见，为何独严修奏请经济特科暴得大名？这与当时士人思想观念的普遍转变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后，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十九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转折点[34]，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开始从沿海的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内地扩展，从数量有限的一批洋务官员向广大的士绅阶层渗透，士人普遍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如吴汝纶，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长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光绪二十二年与友人牛蔼如论及书院变革时认为：“天算、格致等学，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自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35]。这种对西学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光绪元年《万国公报》所称“西学源自中国”等传统夷夏大防观点的批评，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如蔡元培，光绪二十年来京应散馆考试并被授翰林院编修，正值甲午战争拉开序幕，从此其再也不埋首于传统旧学之中，据《蔡元培年谱》记载，“自此时起，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之术报刊物，并留心世界事物”[36]。

戊戌维新时期吴汝纶、蔡元培可能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言辞激烈，但吴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中外，唯是之求”，是同光年间的古文大师[37]，而蔡元培是新科进士，被时人称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隽材”[38]。同时作为一省高官的学正严修，在光绪二十二年给其子写信指导读书门径，略谓：“总而计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备检者，有当精习者。……《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事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也。……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当精习者也。准此为之，十年之后，规模亦略具矣。……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39]。在其所列四种应该精习的科目中，仅古文一项为传统旧学，其余皆为西学，可见西学在其心中地位之重。以上三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个人阅历，却有着同样的思想变化，更广泛地反映了十九世纪90年代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动态，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界思想观念已逐渐实现普遍的转变。

开设经济特科，是朝廷破格求才以维时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戊戌变法步入高潮的肇始。经济特科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直接作用，社会上关于变革教育的讨论已成化民成俗之势。“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称：“近因开经济特科，各省京官亦多立有学会……如此风气渐开，将来必有人材挺出为国家之用”[40]。梁启超也认为：“振起教育之精神，实始于此”[12]。

尽管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此次经济特科戛然而止，但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变。梁启超后来谈到戊戌变法时说到：“诏遂下，于是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为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

以顿释矣。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八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 [41]。在这里概括点出了“戊戌变法”于当时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作为戊戌变法“最初之起点”，严修及其奏请开设的经济特科，开启了戊戌变法，促成了汹涌的社会变革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教育的面貌。

参考文献

- [1]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491.
- [2]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100.
- [3] 关晓红. 关晓红语[M]//关晓红.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92.
- [4] 庞思纯, 郑文丰. 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81.
- [5] 严修. 严修日记(1894-1898) [M]. 陈鑫, 整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 100.
- [6]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48.
- [7] 庞思纯, 郑文丰. 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82.
- [8]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85.
- [9]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106.
- [10] 黄炎培. 清季各省兴学史[J]. 人文月刊, 1930, 1(8): 9.
- [11]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34.
- [12]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46.
- [13]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493.
- [14]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121.
- [15]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6.
- [16] (清)魏源.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同治七年刻本[M].
- [17] 陈学恂.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3.
- [18] 高时良, 黄仁贤.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621.
- [19]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53.
- [20]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0.
- [21]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9.
- [22]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30.
- [23]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07.
- [24] 严复. 救亡决论[M]//王栻. 严复集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0-54.
- [25] 梁启超. 论学校二[J]. 时务报, 1896(7): 412.
- [26]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3.
- [27]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4024.
- [28]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4026.
- [29] 论特科为国家自强之本[J]. 《申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三十日.
- [30] 第 70 号《经济宜专》[N]. 湘报, 1898(70).
- [31]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17.
- [32]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一)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95.
- [33] 第 109 号《本省公牍》[N]. 湘报, 1898(109).
- [34]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35] (清)吴汝纶. 吴汝纶尺牍[M]. 徐寿凯, 施培毅,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87.
- [36] 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
- [37] 蔡冠洛. 清代七百名人传(下)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4: 1809.
- [38] 翁同龢. 翁同龢语//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 [39] 严修. 严修年谱[M]. 高凌雯, 补, 严仁曾, 增编, 王承礼, 张宇平, 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89.
- [40] 刘光第. 致刘庆堂第五十四函[M]//刘光第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80.
- [41] 中国史学会. 戊戌变法(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5.